

周恩来殚精竭虑治水患

□ 陈立旭

中国是世界上江河湖泊较多的国家之一，也是水患严重的国家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总理特别关注对水患的治理，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。

“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长江、淮河发生水灾。特别是淮河水灾，给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。

中央把治理水患当作头等重大事来办。周恩来与时任水利部长傅作义一起，召集水利专家和财政、物资部门的负责同志，一起制定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。

在研究、落实的过程中，周恩来要求各部门、各地区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，以战斗的姿态，不讲价钱的落实。

周恩来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，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、充实，再组织专家进行反复研究。1950年10月14日，周恩来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，作出了《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》，并于当天发布。在这个决定中，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

点。

决定做出了，下一步就是落实的问题。1950年冬季，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。在那个缺粮的年代，粮食是最关键的物质条件。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，主要是靠投入人力。只要有了粮食，就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，治淮就能顺利进行。周恩来抓住了这个关键点。在他主持下，政务院召开专门会议，做出决定，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.5亿斤，小麦2000万斤。大批粮食的调入，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。

治淮工程开始后，周恩来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治淮上，可以说，做到了殚精竭虑。他在一次和水利专家的谈话中说了这样的话：“大禹治水，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，中国科学家的努力，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”。“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，‘其功不在禹下’”。

周恩来正是用“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”的高标准来治理水患的。他深入到治理淮河工程第一线，对每个细节都认真了解，听工程师们的汇报非常细心，每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问。他还要求工程师们把水文资料加以整编，给制定淮河流域的防洪与水资源开发计划打下了基础。此后几十年，淮河流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水患。

“好，我来管”

上世纪50年代，毛泽东在巡视长江时，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“南水北调”引汉江水补黄河水的设想。这个设想经过科学规划形成了治理长江、南水北调工程的蓝图。这是当年党中央抓的最大的水利工程，牵动国家许多部门和几个大省。1958年2月，毛泽东把治理长江、南水北调的重任交给周恩来。他对周恩来说：恩来，这些问题今后就由你来管吧！毛泽东边说边伸出四个手指头比划说：“一年抓四次。”周恩来爽快地答道：“好，我来管。”

毛泽东要周恩来一年抓四次，实际上，周恩来抓得比四次多得多。就在毛泽东交给他这项任务的当月（即2月）底，周恩来出访朝鲜刚刚回国，来不及休息，就赶到湖北视察长江三峡。1958年初，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研究决定将一份《长江流域规划报告》拿到3月在成都召开的专门会议上，周恩来为了使这个报告和其他材料更充分，2月下旬亲自查勘了三峡坝址。在船上，周恩来听取汇报，主持讨论，仔细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问题，沿途经历十多天的劳累，顾不上休息，又于3月7日晚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，出席中央成都会议。在成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周恩来作了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专题报告。根据周恩来的报告，中央正式作出了《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》的决议。这个决议，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重要文献。

中央成都会议同时决定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工。为了迅速执行这一决定，成都会议一结束，周恩来就在湖北召开了有关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，确定由王任重主持该项工程，对中央负责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设计，湖北省政府组织施工。自1966年2月复工以来，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，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胜利建

成了，改变了原来江汉平原三年两淹的局面，发电、灌溉、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。

“不能只求治标，一定要治本”

周恩来治水患，深有战略眼光，他把治水患与水利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，着力于制定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。

1949年11月，周恩来亲自确定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。水利建设的方针是：防止水患，兴修水利，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。水利建设的任务是：依据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人民的需要，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、物力及技术等条件，分轻重缓急，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、发展防洪、灌溉、排水、放淤、水力以及疏浚河流、兴修运河等工程。

为了贯彻水利建设方针，完成水利建设任务，周恩来说：“我们不能只求治标，一定要治本，要把几条主要河流，如淮河、汉水、黄河、长江等修治好。”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，国家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。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，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家政府，每年都增加水利建设经费。

周恩来经常深入到水利工程第一线调查研究，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治水患的办法。他曾经亲自到治淮第一线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治淮方案；他冒着风雪严寒视察荆江大堤；他三到三门峡，在水库工地上度过八个日夜；他亲自勘选三峡坝址；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劳动，六次到密云水库工地解决问题。北到东北，南到海南岛，大部分水利工地都留下了周恩来的足迹。即使是在外地视察或者开其他重要会议，只要听说有水利工程，他就要到现场看看。

原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将军回忆过这样一件事：“1958年，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。7月17日夜，黄河铁桥十一号桥墩被冲毁，京广线受阻。周总理知道后，次日下午就带着我们乘飞机赶到郑州。在飞行途中，总理和我们谈论到西晋时杜预曾在孟津架过浮桥。一下飞机，总理就叫人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，同时听取汇报，了解实情。接着，又到大桥上视察，一直忙到夜间十一点半。为了尽快恢复南北运输，总理不顾疲劳，又要求连夜召集群众开会，动员抢修。这时，职工已经入睡，听见钟声，都赶到宿舍球场。大家见总理精神抖擞地站在前面，情绪十分激动。总理说：‘历史上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桥，我们现在一定能够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桥。’他号召大家献计献策，同心同德，早日把桥修好。开会期间，下了一阵雨，有人要给总理打伞，他婉言谢绝了，一直冒雨把话讲完。听了总理的讲话，群众的热情很高，会上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。经过十四昼夜奋战，大桥很快修复了。8月5日下午，周总理再次来到大桥工地，同工人、战士、社员会面”，“回到住地，又听到济南黄河铁桥也出现了险情的消息，总理不顾劳累，次日又飞抵济南视察”。

周恩来在任期间，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，在他的领导下，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，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，都是他亲自主持审定。

（摘自2017年第6期《世纪风采》）

“子弟兵”称谓的由来

□ 党史文

“子弟兵”一词，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亲切称呼，这个称呼出自聂荣臻当年领导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。1937年11月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，率领3000人的武装，在晋（山西）、察（当时的察哈尔省）、冀（河北）三省边界地区，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。建立根据地后，聂荣臻立即着手扩大人民武装力量。当时在晋察冀，出现了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，如“阜平营”“回民支队”“灵寿营”“平山团”等。1939年5月，聂荣臻发布通令，嘉勉平山团作战英勇，屡立战功，是“捍卫民族、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

的优秀平山子弟兵”。这是“子弟兵”一词首次用于称呼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。1939年底，晋察冀军区冬季反“扫荡”战役取得胜利，社会各界发来大量祝贺函电，盛赞聂荣臻将军指挥有方，屡建奇功。聂荣臻在《抗敌报》上复信指出，晋察冀成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，是“全边区父老和子弟兵的血肉所创造出来的”。晋察冀军区创办的《抗敌三日刊》，也改名为《子弟兵》。就这样，“子弟兵”这个称呼，就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，更能体现军民的鱼水深情。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在1940年春到晋察冀考察之

后，撰写了《华北敌后——晋察冀》（1940年出版）一书，书中称颂道：“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，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，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。”后来，“人民子弟兵”这五个大字，成为人民对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亲切称谓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（摘自2015年第7期《党史文苑》）



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

□ 夏雨

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，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向民众开展革命宣传，在上海建立起了第一个人民出版社，由李达负责。我国近代的出版机构，多称“书局”“书社”“印书馆”等，而该社首次使用了“出版社”的名称。

李达是湖南零陵(今永州市)人，1920年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，并主编《共产党》月刊，参与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；在中共一大上，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。李达在沪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，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。此系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，建筑面积74平方米，底层是客堂，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，后面亭子间即编辑部，楼下是客厅。这里虽然简陋，但周围民居成

片，门户相仿，便于隐蔽；一旦遇到意外情况，因前后有门，独进独出，四通八达，可以迅速撤离。

《新青年》第九卷第五号曾登载《人民出版社通告》，阐明其宗旨和任务：“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，本社同人为了供给此项要求起见，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，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。本社出版品底性质，在指示新潮底趋向，测定潮势底迟速，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，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。”

1921年11月发布的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》中则明确要求：“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，必须出书（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）20种以上。”经李达的具体筹划，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，准备推出“马

克思全书”15种，“列宁全书”14种，“康民尼斯特（英文“Communist”的音译，即共产主义）丛书”11种，其他读物9种。仅数月的时间里，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12种，各印3000册。由于那时环境十分险恶，条件非常艰苦，最终这些书籍未能全部出齐。

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，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，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。1922年11月，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，去湖南自修大学工作。翌年夏秋间，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。人民出版社虽独立存在的时间不长，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（摘自2009年第9期《文史月刊》，原标题为《我党的第一个出版社》）

聂荣臻与白求恩的交往与友谊

□ 吴耀明

1937年11月，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——晋察冀根据地。在晋察冀边区，聂荣臻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友好人士，如美国军官卡尔逊，燕京大学教授、英国人林迈可，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等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——白求恩。

聂荣臻与白求恩的交往

诺尔曼·白求恩，1890年3月3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。1935年，白求恩因医术精湛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、理事，同年11月，加入加拿大共产党。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，率加、美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1月从温哥华经香港来到中国内地，又从武汉到延安。6月，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冲过敌人封锁，到达了驻在山西省五台县金库崖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。

聂荣臻听说白求恩来了，连夜从外地赶回，第二天早上接见了

少、技术落后不适应战争需要，就决定创办一所模范医院。聂荣臻同意了他的要求，把建议提交延安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。中央同意后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在五台县松岩口村建成了一座有手术室、消毒室、医务室、洗涤室的模范医院。1938年9月15日，聂荣臻亲自出席了医院的落成典礼，并宣布白求恩为院长。

在近两年的时间里，在聂荣臻的关怀和支持下，白求恩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，以忘我的革命热情在硝烟战火中以继日地救治八路军伤员，曾创造了69个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。他在战争间隙，笔耕不辍，写作了大量的报告、信件、演讲稿、新闻稿和短篇小说等，发到加拿大、美国 and 英国的刊物上发表。仅在1938年，他就写了6.5万字。这些文字，有力地宣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。

1939年7月，由于日寇封锁，边区医疗器械、药品严重短缺，白求恩

决定申请回国募集经费、药品和医疗器械，同时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，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。聂荣臻把白求恩的想法报到延安，中央复电同意。就在白求恩行将动身回国的1939年10月，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“扫荡”，白求恩毅然决定留下，他对聂荣臻说：“我不能在战斗的时候离开部队！等这场战斗结束，我再启程。”

白求恩带医疗队赶往深源摩天岭的前线，在临近火线的孙家庄小庙里设立手术室抢救伤员。一天下午，在为伤员做手术时，他的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刺破，局部发炎肿胀。11月1日，一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被抬下火线，需要立即手术。这是一种外科烈性传染病。白求恩不顾劝阻，进行抢救。其间，白求恩的手套被划破，病毒侵袭了他受伤的左手中指，受到了严重感染。聂荣臻闻讯当即指示：“一定请白求恩大夫休息好，并抓紧时间治疗。”5日，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，但他却说：“不要担心，我还可以照样工作。”11月10

日，白求恩高烧不退，聂荣臻闻讯马上派人送来急信，再次命令他：“立即回唐县花益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！”随后，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，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安全转移出来。当聂荣臻派来的人员赶到时，白求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，曾一度昏迷，终因伤势恶化，转为败血症。1939年11月11日，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白求恩，给聂荣臻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遗言：

亲爱的聂司令员：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……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！请你给蒂姆·布克（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）写一封信，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十号门牌。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。告诉他们，我在这里十分快乐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。

……两个行军床，你和聂夫人留下吧，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。

……

我不能再写下去了。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。

聂荣臻与白求恩的友谊

1939年11月12日5时20分，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、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白求恩与世长辞。聂荣臻接到电话后顿时泪流满面。两天后，白求恩的遗书和遗物送到了聂荣臻手中。他后来回忆起展读白求恩遗书的那一刻说道：“看到他的临终遗言，想起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，以及对边区卫生工作的建树，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人，也止不住涌出了热泪。”

感人心者，莫先于情。在工作 and 生活的交往中，聂荣臻和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聂荣臻对白求恩生活和工作上关怀备至、百般照顾，每次一起吃饭时，聂荣臻自己吃小米、咸菜，让白求恩吃少有的大米饭，并想办法找烤面包的师傅，而白求恩却不搞特殊，总是说，“我不是来享受

的”。聂荣臻对白求恩的评价是：“白求恩大夫是一个能够让人的灵魂得到净化的人。”白求恩生前和聂荣臻谈心、交流，聂称呼白“伯琴”，白称呼聂“亲爱的聂司令”。他们像兄弟一样憧憬着打败敌人后的美好前景。

白求恩逝世后，聂荣臻写下《纪念白求恩同志》一文，文中称白求恩是“无产阶级最英勇的战士之一和被压迫民族最忠诚的战士”，并“准备把军区卫生学校改名白求恩学校，准备以军区一个模范医院定名为白求恩医院，以永远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国际朋友”。1940年1月5日，在唐县军城南关村举行的万人追悼白求恩大会上，悲痛

的聂荣臻用哽咽的声音在白求恩灵前宣读了祭文。

1979年，在白求恩逝世40周年之际，聂荣臻写了《“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”——怀念白求恩同志》一文纪念。白求恩逝世50周年之际的1989年又写了《今天仍然需要提倡白求恩精神》发表，并以90高龄接受《人民日报》采访，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。

（摘自2017年第24期《领导之友》）

